

#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MEIGUOBAQUANDESHUILUOYUZIBENZHU YISHIJITIXIDEZHONGJIE

远航一号 著

· 红色中国 ·

#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远航一号 著

· 红色中国 ·



# 目 录

前言 .....	6-9
美国霸权衰落以后的世界 .....	10-14
霸权国家的衰退不可避免 .....	15-21
美国、石油与中东问题 .....	22-31
霸权衰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 .....	32-34
中国可以代替美国吗? .....	35-45
霸权与世界经济 .....	46-52
对“中帝论”的反驳 .....	53-57
中国的国际前途 .....	58-65
结语 .....	66-77



## 前 言

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从阿富汗狼狈撤退，撕掉了美帝在中东霸权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将美帝霸权的衰落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好像，连中国资产阶级都“看懂了”。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真的看明白当今世界的大势了吗？美帝霸权衰落，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以开始了呢？或者如某人所说的，“东升西降”？美帝霸权的衰落，对于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对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喜，还是忧？这些，都是问题。

在笔者看来，美帝霸权的衰落，不仅不意味着“中帝”霸权的开始，反而将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空前的混乱和危机，并最终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外部条件，进而开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的世界历史进程。

要探讨这些问题，当然首先需要说说，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所谓“霸权”国家，当然是在一个时期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怎样来衡量“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才算霸权？

到目前为止，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严格来说，曾经出现的霸权国家只有三个，那就是十七世纪的荷兰（联合省）、十九世纪的英国（联合王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合众国，也可译为“联合州”）。

十五和十六世纪，统治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虽然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因为当时的西班牙并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积累中心。

十七世纪的荷兰，无论按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不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1700年时，荷兰的经济总量约为法国的五分之一、英国的五分之二。但是，荷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显著超过当时西欧的平均水平。1700年时，荷兰的人均GDP是西欧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是英国人均GDP的1.7倍。荷兰垄断着当时利润最丰厚的波罗的海干货贸易和东南亚香料贸易，其海军控制着印度洋。所以，荷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承担着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积累中心的职能，也是欧洲最“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十九世纪的英国，无论按人均GDP还是按经济总量，都是欧洲最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的1850年，英国的人均GDP大约比西欧平均水平超出了50%，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英国的陆军从来不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是英国通过所谓“力量均势”政策操纵欧洲大陆上的各大国（主要是法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以及统一后的德国），以确保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对英国霸权构成威胁。英国海军则牢牢控制着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以金本位和自由贸易政策为依托，英镑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储备货币，英格兰银行得以操纵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金融市场。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英国从来没有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本土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六分之一；甲午战争之前的189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仍然相当于英国的约1.4倍。另一方面，英国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在极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

1870年时，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赶上英国，但是在人均GDP方面仍然落后于英国。到了1900年，美国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相当于英国的1.7倍。但是，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英国仍然是公认的世界霸权。到了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英

国的三倍多，美国的人均GDP显著超过英国，美国已经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但是，即使到了这时，仍然不能说美国已经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英国霸权的衰落，加上美国无力或者不愿意承担霸权的职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才毫无争议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195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强，美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美元与黄金挂钩，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的陆军占领着西欧和日本，海空军统治着全球各大洋，并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以及最强大的核武库。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四分之三个世纪，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昭然若揭，几乎路人皆知。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否就会为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帝”的霸权铺平道路呢？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预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几年也会超过美国。但是，如上所述，经济总量的大小仅仅是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是否“强大”的一个参考指标。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霸权国家未必就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即使一个国家成为了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也很可能不是霸权国家。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达到美国的27%；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人民币仍然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在世界市场上，按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约占国际贸易总值的3%。

中国与周边国家尚有相当数量的领土领海争议没有解决，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尚未完成。中国的海空军甚至无法掌握周边邻



近海域的制海权、制空权。中国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海上贸易航道均在美国或者潜在敌对国海军的监视之下。

当然，按照“星辰大海”的观点，假以时日，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终将确立对美帝的绝对优势，并统治世界。

然而，中国资本主义能够在未来几十年保持“正常”发展吗？即使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了，中国就能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霸权吗？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除了经济总量最大以外，还需要哪些其他条件？如果说，美帝的衰落已经无可挽回，而“中帝”的“伟大复兴”又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面临怎样的下场，世界革命又将开辟怎样的前途呢？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以随笔的形式逐篇探讨。

## 美国霸权衰落以后的世界

美国霸权衰落以后的世界将是怎样的？是像以往的几次霸权更迭那样，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来代替美国，还是从此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如果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这个新霸权会是资本主义中国吗？如果从此天下大乱，其结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重整以后“新生”，还是彻底土崩瓦解，为新的社会制度扫清道路？

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霸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粗通经济学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宣扬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制度，但是也不否认，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失败”无处不在（只有中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掩耳盗铃地将其称之为“市场失灵”），从而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必须要依赖政府的调节以及“公共品”的供应才能正常稳定运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许多个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关于“民族国家”的起源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须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此处暂不赘述）。各个“民族国家”都追求自身资本积累的最大化；但是，如果没有某种更高一级的政治制度的调节，各个“民族国家”各自对

资本积累的追求就会反过来破坏整个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些共同条件，并最终毁灭整个体系。

然而，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又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作为一个无限追求资本积累的体系存在下去，也不允许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在若干个比较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出现一个相对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就成了调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某种形式“世界政府”的不完美替代品。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哪些必须要依赖霸权国家来调节的“公共利益”呢？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各个主要的“民族国家”（主要是欧洲各大国）曾经长时期地相互之间征战不休，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时代，战争规模之大，已经要求各主要交战国动员全部的或者相当大一部分的成年男性。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中，一方面，英国依靠其海军优势以及英吉利海峡的天然保护，充当了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仲裁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到亚洲，印度、中国两个人口大国（当时两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一半）纳入世界市场以后，大大缓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瓜分非洲”的完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达到了地理极限。在欧洲，德国完成统一以后，英国已经无力维持欧洲大陆上的“力量均衡”。随着英国衰落，德国力量上升，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急剧升级，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样，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多国竞争已经发展为大国相互之间的“倾国之战”。各主要交战国均投入了全部成年男性并消耗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战争空前残酷。不仅欧洲文明几乎被毁灭，即使是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较晚的亚洲，中、日两大国也卷入了这种“流尽民族最后一滴

血”的殊死搏斗。如果不能制止这种战争和屠杀的不断升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很快自我毁灭。

在这方面，美国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胜利者。由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对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优势，在两次大战中本土又没有受到损失，生产能力反而快速扩张，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无论在核武器还是在常规武力方面都确立了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绝对优势。

当然，这里说的绝对优势，并不是说美国的军事能力不受任何边界的限制，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就显示了美国武力难以逾越的极限。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确实已经大到可以有效避免各主要大国相互之间的全面战争，从而保证了此后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各主要大国相互之间的“和平”。

除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以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还承担着另外两个不可或缺的职能，一是维持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稳定，二是调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阶级关系。关于维持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稳定，涉及到一些专业内容，以后再进一步阐述。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只要是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的统治就经常要面临怎样防止、化解并镇压各个被剥削阶级反抗的问题。对于剥削阶级来说，要减少被剥削阶级反抗的可能性以及“危害”，一方面，要努力破坏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相互之间的团结，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另一方面，要努力加强剥削阶级内部的团结，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一些中间势力吸引到自己这个方面来。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方面要面对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分别处于外围、半外围、核心三个不同层次的国家之间的矛盾。

为了维持体系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就需要维持好体系内部三个不同结构性层次的资本家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核心国家

的垄断资本家能够得到最大份额的利润，可以充当积累中心，又要保证外围、半外围的资本家可以“雨露均沾”，而不至于离心离德。

此外，还需要在体系内部的劳动群众之间制造矛盾，将其中最具有技能、最有生产力的一部分收买过来，使其作为“工人贵族”，充当统治阶级与大多数劳动群众相互之间的缓冲。这种对“工人贵族”的收买也要恰到好处，一方面，要让渡足够的剩余价值，多到足以让“工人贵族”放弃社会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让渡的剩余价值又不能太多，以至于威胁到体系的资本积累或者各个资本家集团相互之间的团结。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另外一个困难就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理上的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不断深化，每过一个历史时期，就会产生一批新的阶级或者其他社会力量，从而破坏原有的阶级妥协。

比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方面，随着欧美诸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壮大，要求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新兴的本土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则要求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得到更高的地位（表现为“民族解放”的要求）。在上述两种运动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更为激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了应对上述的全球范围的社会挑战，美国在霸权地位巩固以后，领导了全球阶级关系的重组。在美国内部，通过罗斯福“新政”以后的社会改良，美国给各个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做出了榜样，通过向西方工人阶级让渡一部分政治和经济利益（以“自由民主”和“福利国家”的形式）来换取西方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切割”。在外围和半外围方面，为了回报苏联统治集团放弃世界革命，美国允许苏联拥有从鸭绿江到易北河的广大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向处于衰落中的英、法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在亚洲和非洲实现“去殖民化”，美国将亚非国家的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拉拢到自己这一边，

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足以威胁整个体系稳定的团结。

可见，霸权国家对于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稳定，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要发挥这样的稳定作用，霸权国家相对于其他各大国来说必须足够“强大”，“强大”到具有几乎压倒性的优势。这是因为，只有足够“强”，霸权国家才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维持整个体系的利益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的某大国，以迫使后者就范；另一方面，只有足够“大”，霸权国家自身的利益才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与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相重合，从而霸权国家才会有充足的动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更迭的历史，就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作为霸权国家的“强大”标准也是不断升级的。十七世纪的霸权国家荷兰，只是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尚不具备民族国家的完全形式。十九世纪的霸权国家英国，虽然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但是其本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是在欧洲范围内才可以算是一个“大国”。而到了二十世纪，只有美国这样领土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人口数亿的大陆级大国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

可以说，每一次霸权更迭，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国家所需要的“强大”标准都增加了一个数量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不再有比大陆级国家更大的国家，更不会有相对于现有大陆级国家还能确立压倒优势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更迭周期是否即将终结？随着这种霸权更迭周期的终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否也将终结？

## 二

# 霸权国家的衰退不可避免

上一期的霸权问题随笔讲到，霸权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霸权国家的稳定作用体现在：确保大国之间的相对和平；维持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宏观稳定（待阐述）以及建立并巩固一个相对稳定的全球范围的社会秩序。

要承担这些职能，霸权国家必须具有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压倒性的优势，从而做到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在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之外维持整个体系的长远的和共同的利益。这种压倒性优势，首先表现为霸权国家在物质生产能力（特别是工业生产能力）方面的优势。比如，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制造业出口曾经一度占到世界市场上制造业产品贸易额的近一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也曾经达到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英、美两国在其作为霸权国家的鼎盛时期，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大的工业生产国，而且其工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是整个体系中最高的。

工业生产能力的优势进而转化为军事方面的优势。英国霸权曾经长期维持所谓“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军舰的总吨位要超过除英国以外最强的两个海军强国军舰总吨位之和。美国的军费开支长期

以来一直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近一半；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主张，美国要具备在全球任何地方同时打两场重大局部战争的能力。

霸权国家的工业优势和军事优势又转化为金融方面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霸权国家的主权货币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主要支付手段以及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霸权国家的主要金融市场同时充当着全球金融交易的中心。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霸权国家在其鼎盛时期，在工业、军事、金融等方面相对于其他各大国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为什么以往的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呢？

在霸权国家的鼎盛时期，霸权地位可以给霸权国家的资产阶级带来丰厚的垄断利润。但是，维持霸权运行的成本也是高昂的。202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近800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净投资在正常年景也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

除了高昂的军费开支以外，为了吸引全世界最有技能、生产率最高的工人，并维持霸权国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霸权国家的资产阶级要向本国的工人阶级提供高工资、高福利。在历史上，在荷兰、英国、美国处于霸权国家的时期，这几个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是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高的。

要在高工资的条件下维持高利润，霸权国家就必须经常保持对若干附加值最高的经济部门的垄断。英国、美国在各自的极盛时期，都事实上形成了对世界市场上主要工业部门的垄断。但是，恰恰因为霸权国家的有效运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平稳发展，这就为非霸权的核心国家乃至半外围国家通过技术模仿赶超霸权国家创造了条件。假以时日，霸权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多领域的竞争；一方面垄断利润被侵蚀，另一方面历史上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从而导致霸权国家在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领域逐步丧失竞争力。



比如，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而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德国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且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在世界工业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逐步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一度控制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工业部门；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西欧、日本分别完成了经济重建，并且掌握了美国首创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便将美国企业从本国市场中逐步排挤出去，而且还在若干领域在美国本土市场上与美国企业竞争。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决定了霸权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鼎盛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前面说了，霸权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建立并巩固一个相对稳定的全球社会秩序，通过将全球劳动群众以及外围、半外围地区的“精英”集团中一个足够大的部分吸收到现有的社会秩序中来，使得这些社会集团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从而达到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有能力要求分享世界剩余价值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要求对原有的社会妥协秩序提出挑战，并且渐渐地超越了原有的社会妥协秩序可以容纳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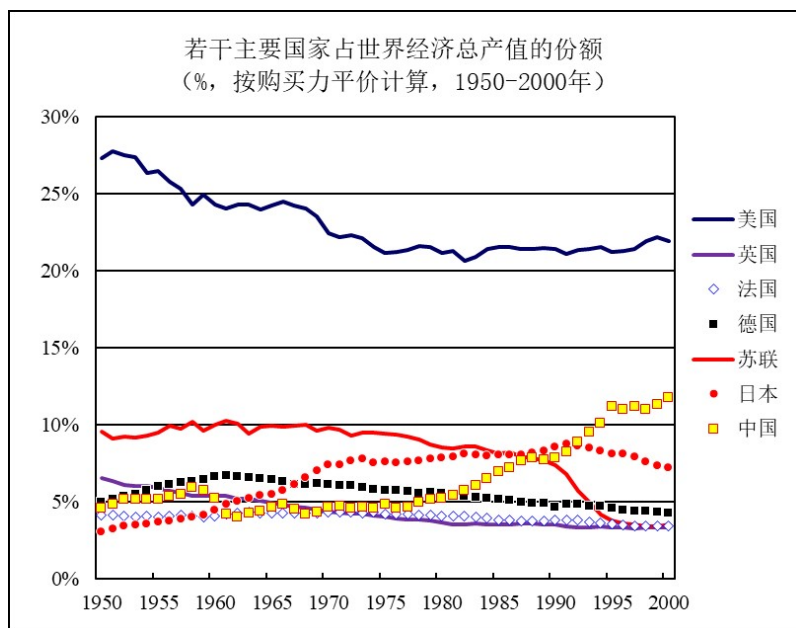
比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历了十九世纪的长期发展以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就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广大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实质上属于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挑战，造成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

在美国霸权鼎盛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但是，在核心国家，在经济繁荣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益的女性、少数族裔和青年劳动者要求得到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南欧、东欧、拉丁美洲等半外围国家在这一时期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队伍发展壮大，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发展为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福利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霸权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各个核心国家和一些主要的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的统治都面临着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挑战。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美国的垄断资本家面临着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在石油危机与通货膨胀的打击下，美元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下图说明了世界上若干主要国家的经济产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份额在1950年至2000年期间变化的情况。其中，1991年以后，“苏联”指的是前苏联地区。



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恢复美国霸权的优势，美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几个重大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大幅度提高利率，用人造经济衰退的方式制造高失业，迫使美国工人阶级屈服，同时将资本积累的重心从物质生产向金融投机方向转移。

第二个步骤，就是借着世界金融市场利率大幅度提高的机会，引爆半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结构调整”，又迫使苏联东欧集团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是重新调整主要半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中的作用，迫使这些国家放弃经过几十年积累已经形成的传统工业，将这些国家改造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同时打垮这些国家中那些对于资本主义全球积累来说已经过于“昂贵”的工人阶级。

第三个步骤，就是将一批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可以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具备资本积累其它方面条件的地区（比如，政治稳定、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劳动力普遍受过基础教育等）。随着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正好迎合了美帝国主义重建霸权以及资本主义全球经济重组的需要。

在采取了这几个步骤以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稳定和巩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计算机和新信息技术得到普及，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一度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美国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有所恢复。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霸权不仅实现了“复兴”，而且在世纪之交一度出现了如日中天的势头；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甚至提出了要建立“美利坚帝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的狂妄主张。

然而，从长远来看，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霸权没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不仅最终不能制止美帝国主义的衰落，而且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从而为现存社会制度的最终灭亡准备了条件。

首先，美国资产阶级向本国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及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向本地区工人阶级的进攻，破坏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核心国家内部一度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阶级妥协。到了本世纪初，美、欧、日等核心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重新出现了激化的趋势。这种核心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目前来看，暂时还不会在核心国家内部造成新的革命形势，但是却足以破坏核心国家自身

的资本积累，进而打乱资本主义全球分工并削弱衰落中的美国霸权维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稳定的能力，从而为世界其它地方的革命运动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重组的主要受益者。中国的庞大廉价劳动力不仅为中国资本家提供了大量剩余价值，而且通过不平等交换向美国等核心国家转移了大量剩余价值，从而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相对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对中国劳动群众的剥削，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一代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假以时日，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必然有能力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又必然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

由于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无力同时容纳核心国家、传统半外围国家（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以及新兴半外围国家（主要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这就为未来的世界革命高潮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空间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大量消耗煤炭的基础上，这就极大地加剧了全球环境危机的发展，全球生态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人类所面临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世界历史抉择，已经不是关于未来的寓言，而是当下革命运动不得不承担的紧迫任务。

不过，就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说，美国霸权为了“复兴”而对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重组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地缘政治的严重不稳定，特别是对于世界能源生产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的严重不稳定。

在上一期随笔中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对苏联放弃世界革命的回报，美国同意苏联拥有从鸭绿江到易北河（即从东北亚到东欧）的广大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霸主地位，美国则将维持整个

欧亚大陆东半部经济和政治稳定的职能转让给了苏联。在这个意义上，美、苏共同维持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这种“协作”以后又通过所谓“冷战”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这并不是说，美、苏双方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双方不会以种种方式试探雅尔塔协定的边界，试图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总的来说，从1945年至苏联解体，美、苏双方基本上没有突破雅尔塔协定的框架。

在中东地区，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形成了控制中东地区的三个桥头堡。另一方面，苏联则支持宣称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三个民族解放运动政权。在经过了几次中东战争以后，两方面的力量也达到了相对均衡。

然而，随着苏联陷入危机，中东地区原有的力量相对均衡被破坏，原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政权或者垮台或者变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趁机崛起。中东地区失去稳定以后，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发祥地欧洲地区，同时也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所需要的能源供给。这就诱使美帝国主义动用其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新的战争冒险。出乎美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这一冒险后来被历史的实际发展证明是美国霸权的催命符。

### 三

## 美国、石油与中东问题

历史上，欧洲人将欧洲以东的地区，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分别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现在人们一般所说的中东地区，包括西亚各国和北非的埃及，共17个国家。中东地区总面积约72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区。2020年，中东地区共生产石油13亿吨（日均产量约2800万桶），占世界石油产量的31%；生产天然气约6900亿立方米（约合5.9亿吨油当量），占世界天然气产量的18%。

中东地区的西面毗邻欧洲和非洲，北面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接壤并隔黑海、里海与俄罗斯联邦相望，东面经过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可以分别到达印度或中国，并扼有红海、波斯湾等海上贸易要冲，堪称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现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区又沦为英、法帝国主义“委任统治”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意识觉醒。在纳赛尔领导下，埃及将长期被英、法帝国主义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对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民族经济；这就是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和叙利亚一度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想要以此作为未来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原型。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石油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能源支柱。从二十年代起，英、美资本家在中东地区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1933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今天的雪佛龙公司的前身）从沙特阿拉伯政府那里获得了石油开采的特许权，并成立了子公司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1943年，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改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英文缩写Aramco）。

此后，美国垄断资本长期控制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业；直到1988年，该公司才被沙特阿拉伯收购为国有。今天，该公司是世界上市场价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其日均原油产量900万桶，约占世界石油产量的十分之一。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另一个石油生产大国。1951年，主张社会进步的伊朗首相摩萨台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决定对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英伊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在伊朗石油国有化的过程中，伊朗人民党（实际上就是伊朗的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支持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3年8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事情报局的共同策划下，伊朗反动势力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专门拨款100万美元，用于“以任何方式”推翻摩萨台政府。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曾经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良好。但是，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由于以色列与英、法帝国主义共同反对埃及恢复对苏伊士运河行使主权，以色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恶化。此后，以色列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并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又名“六日战争”）中打败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合阵线。

这样，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通过扶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结成军事联盟并控制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业，形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称霸的三根支柱。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世界革命高潮兴起，美国霸权盛极而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制裁，导致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油价暴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一跃为高收入国家，伊朗经济出现了畸形繁荣。但是，伊朗的畸形“现代化”导致贫富悬殊，严重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

这个时候，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觊觎伊朗的石油资源，认为伊朗得罪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且伊斯兰革命后伊



朗军队人心惶惶、实力下降，自以为获得了天赐良机，于1980年发动了侵略伊朗的战争。结果，出乎萨达姆意料之外，伊拉克侵略军遭到了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的坚决抵抗；两年后，伊朗方面发起了反攻，围攻伊拉克石油重镇巴士拉。此后，战争进入僵持状态，直至1988年停火。

伊拉克在经历了八年两伊战争后，经济陷入困境，急于通过新的冒险改善经济形势、稳定国内政局。这时，苏联国内危机加深，已经无力约束其在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美国则玩起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向伊拉克暗示，对伊拉克的军事冒险将不做干预；另一方面准备利用伊拉克蠢动以后的形势恢复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

1990年，伊拉克入侵并宣布吞并科威特。美国趁机纠合了三十几个仆从国，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军队的主力被消灭。这个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W·H·布什（即“老布什”）很明智地止兵于巴格达城下，决定暂不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决定了保证了中东地区在九十年代的相对稳定。

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恢复了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惨败后一落千丈的军事“声望”。当时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目睹了美帝的侥幸胜利以后，惊恐万状。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斗争以后积累起来的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军队那里，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一时间，中国资产阶级军队中弥漫着恐美畏美情绪，唯武器论甚嚣尘上。三十年后，一批靠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宣传（如《亮剑》这样的反动电视剧）养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者又因为有了几艘航母、几架“五代机”、几部“战狼”电影就飘飘然，自以为可以做帝国主义的迷梦；这种反动妄想同样将被未来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击得粉碎！

到了世纪之交，美国统治集团面临着关于未来的重大抉择。表面上，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如日中天。苏联解体后，美国相对于任何其他大国都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可以毫不费力地打赢任何一场

常规战争。经济上，美国正在经历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繁荣；一度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衰落，欧元尚不构成对美元的威胁；当时中国经济的总量，如按市场汇率计算，仅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美国统治集团也意识到，美国的这些优势只是暂时的。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出现了长期快速增长的势头。假以时日，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可能复兴；更加可怕的是，俄罗斯有可能与欧洲大陆的强国（德国、法国）组成反对美国的联盟，使得美国失去对欧亚大陆的控制。

这个时候，主要是代表美国资产阶级中的能源工业、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其政治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小布什时期的副总统切尼，此人现在是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死敌）酝酿并最终实施了他们的战略设想。新保守主义集团认为，他们应该利用美帝国主义尚且掌握的绝对军事优势，通过一系列战略步骤，从而达到建立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绝对永久霸权的目的。这样一种绝对永久霸权的实质，按照世界体系理论家阿瑞吉的看法，是要建立美利坚统治下的“世界帝国”。

具体来说，就是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控制住中东和中亚地区，然后在这两个地区建立一系列服从于美帝的傀儡政权。这两个地区中，中东地区是世界主要的能源生产基地；中亚地区，则按照当时地质学界的看法，是下一个最有希望发现大量油气资源的地区。新保守主义集团认为，只要控制住了这两个地区，就可以“挟石油以令天下”，牢牢掌握住欧洲和亚洲各国的能源命脉，迫使其他各大国服从美帝国主义的意旨。

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爆发后，新保守主义集团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发动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控制了阿富汗，就等于掌握了连接中东、中亚两大地区的战略要道，并可以对伊朗形成战略包围。2003年，美国又以所谓发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号称“震惊与恐惧”的侵略战争，很快推翻了萨达

姆政权。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在伊拉克建立亲美的傀儡政权；然后，或者逼迫伊朗就范，或者进一步发动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整个中东地区变为美帝武力淫威下的保护国。

萨达姆政权刚一倒台，伊拉克人民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斗争。到了2004年，美军在两次费卢杰之战中受重创。美国动用了其全部陆军地面部队二十多个旅中的一半，仍然不能扼制伊拉克游击战发展的势头。

2007年，美国向伊拉克最后一次大规模增兵，勉强维持住了伊拉克政府的稳定。然而，与美帝国主义的主观愿望相反，美帝在伊拉克的军事冒险，严重削弱了原来作为萨达姆政权社会基础的逊尼派部族的力量，反过来加强了与萨达姆做对、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部族的力量。到了2007年，伊拉克政府如果离开了背后有伊朗操纵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支持，就无法稳定存在。

从2010年起，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至2011年撤军结束，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侵略战争的失败。

美国在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在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但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威望”，奥巴马政府还是硬着头皮要把阿富汗战争打下去。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设法从阿富汗“体面地”撤退，已经成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共识。最终，到了今年8月份，帝国主义的残余军事力量从阿富汗狼狈逃跑，塔利班完成对阿富汗的统一。

美帝在阿富汗的失败，将帝国主义的衰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更重要地是，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出军事力量以后，中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地缘战略真空，由此引起的动荡，将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巨大的威胁。

目前中东地区的形势，十分复杂和微妙，各种矛盾交织，既有各个宗教之间的矛盾，又有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既有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又有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土耳其等国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既有战争和内战的新仇旧

恨，又有对国际能源市场份额的勾心斗角；既有美、俄、欧盟等大国错综复杂的干预，又有核扩散乃至区域核战争的阴影。

在中东地区各国中，至少有三个在未来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崩溃的潜在危险地区。首先是伊朗。伊朗是中东人口第一大国（现有人口约8300万），在2018年受到美帝所谓制裁以前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伊朗统治集团认为自己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有很大的野心。美帝在伊拉克、阿富汗侵略战争的失败，给伊朗造成了空前有利的战略形势。伊朗支持的什叶派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伊拉克政府；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民兵控制着黎巴嫩政府；伊朗与俄罗斯合作，维持着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了原北也门的大部分地区并多次击退沙特阿拉伯组织的多国干涉军。在巴勒斯坦，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伊朗统治集团的长远目标，是使自己成为整个西亚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主宰者。但是，由于受美帝经济制裁的打击，伊朗经济十分困难，加上伊朗统治集团的腐败，伊朗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此外，伊朗在地区称霸的野心，还受到以色列（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和沙特阿拉伯（伊朗在伊斯兰宗教世界内部以及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主要对手）的遏制。

为了取得相对于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伊朗试图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及战略导弹力量。这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恐慌。以色列一方面要求美帝出面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企图，另一方面多次表示，如果美帝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将不惜单方面行动，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以色列经过历史上的四次中东战争，侵占了原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大片土地。目前，以色列约有900万人口，占据了原巴勒斯坦地区的约22000平方公里，占原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巴勒斯坦国控制地区的人口约500万、总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仅占原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在以色列内部，占总人口约五分之四

的犹太人则对占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实行压迫和歧视。

以色列虽然经济发达，但能源和粮食不能自给。过去，依靠美帝的扶植，以色列得以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的这种军事优势正在逐渐削弱。2006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战争的失败表明，今后，以色列很可能已经不再具备发动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的能力。从长远来说，以色列与阿拉伯民族结成了世世代代的血海深仇；一旦以色列不再能保有军事优势，孤悬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侵略和压迫，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现在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还公开支持以色列。一旦美帝国主义进一步衰落，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将无法维持，以色列的处境将岌岌可危。反过来，一旦以色列统治集团意识到不断迫近的危机，也可能孤注一掷发动新的战争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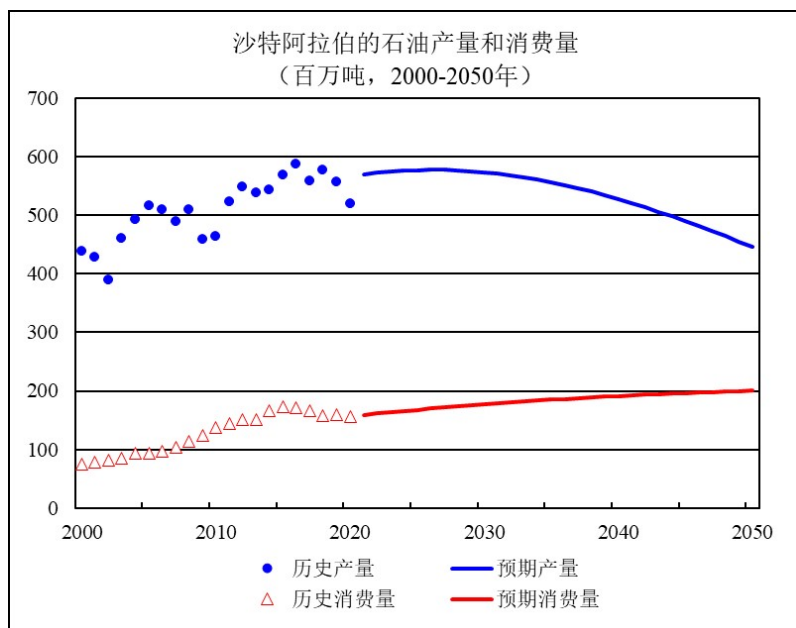
沙特阿拉伯是当今世界仅存的几个君主专制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石油收入占沙特阿拉伯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出口贸易收入的十分之九。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对外国劳工的剥削。在沙特阿拉伯总共约1500万劳动力中，外籍劳工约900万，本国公民参加就业的约600万（其中约三分之二被政府或国有企业雇佣）。为了供养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并为普通的沙特阿拉伯公民提供“福利”，沙特阿拉伯不得不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2020年，沙特阿拉伯的财政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的大约七分之一来自于沙特阿拉伯。但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加瓦尔油田的产量在2005年前后已经越过峰值。该油田自1951年投产，到现在已经生产了60年了，其高峰时期产量日均500万桶，占世界石油产量的5%以上，相当于5个大庆油田高产时期的产量。现在，加瓦尔油田的产量已经下降到大约

日均400万桶。以后，随着沙特阿拉伯早期发现的大油田产量逐步下降，用新开发的中小油田来弥补大油田的产量下降将越来越困难。预计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趋于下降。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为了维持内部社会稳定，对国内消费油价给与大量补贴，人均石油消费量高达4.5吨，几乎相当于美国人均石油消费量的两倍、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的九倍。不仅如此，沙特阿拉伯的人口仍然在按照每年近2%的速度增长。未来，如果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消费继续随人口增长而增长，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却开始下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能力将不断萎缩。

下图说明了沙特阿拉伯未来石油产量和石油消费量可能发生的变化情况。



如图，到2050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能力将从现在的每年约4亿吨下降到约2.5亿吨。2030年以后，随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能力逐年下降，沙特阿拉伯是否还能维持国内的社会稳定并吸引足够数量的外籍劳工，都将成为问题。

总之，随着美帝失去控制中东地区的能力，在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巨大风险。几个大国中，沙特阿拉伯、伊朗、以色列、埃及都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并失控的危险；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区域大国相互之间爆发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危险。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致命的威胁。此外，中东地区的基本秩序一旦瓦解，将产生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难民，涌向欧洲地区。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祥地的欧洲地区，面对如此规模的难民潮，将可能陷于政治和经济的瘫痪；欧洲大陆国家将普遍地外围化或半外围化。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尔干地区好比欧洲的火药桶一样，今天的中东地区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火药桶。

当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还在做帝国梦的时候，美帝的溃逃已经点燃了这个火药桶的第一段导火索。

## 四

### 霸权衰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

在以前的几期随笔中，笔者反复论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不仅是一个时期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存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往，当旧的霸权国家衰落、新的霸权国家尚未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就会趋于白热化，并最终发展为所有主要大国都参加的争霸战争。这种情况曾经在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霸权兴起过程中（“三十年战争”）、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法争霸时期（“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及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德争霸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复出现过。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由于主要大国都拥有了庞大的核武库，足以造成相互毁灭，从而使得全面战争的成本超出了各国资产阶级可以容忍的限度；另一方面也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使得各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想要为了侵略战争而进行全民动员已经变得不可能；因此，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倾全国之力、以消灭敌对国全部战争潜力为目标的全面战争，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会再发生，并不是说，霸权衰落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上一期随笔所介绍的，美国霸权衰落的第一个严



重后果，就是美国失去了保障中东地区政治稳定的能力，而周边的其他各大国都不具备替代美帝来维持中东稳定的能力。中东地区的动荡发展下去，一是会进一步威胁到作为资本主义发祥地的欧洲地区的稳定，二是会严重威胁到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从而直接威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

美国霸权衰落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防止核武器在中小国家中扩散的能力。在所谓“冷战”时期，美、苏各自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库。然而，由于美、苏统治集团内部都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各自都有足够的动机来维护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美、苏之间的所谓“核恐怖下的战略均衡”反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至于真正威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安全。

后来，虽然英、法、中各自都拥有了核武器，但他们的核武库规模较小，不会对美、苏造成威胁。英、法自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忠实维护者，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重返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以后，事实上也放弃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

但是，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对中小国家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发展核武器以及投放核武器的战略导弹能力。目前，除了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合法”的有核武器国家以外，印度、巴基斯坦、朝鲜是三个已经公开宣布并且已经被证实拥有核武器的“非法”有核国家。以色列虽然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但国际评论家广泛认为以色列事实上拥有约100至200枚核弹头。此外，伊朗等国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核武器。

一批中小国家拥有核武器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因为各种偶然原因引起区域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区域核战争可能引发全球核战争）。因为中小国家资产阶级（或其他形式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薄弱。目前的“非法”有核国家中，巴基斯坦濒于“失败国家”的边缘，政治和经济均不稳定。巴基斯坦情报当局与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长期存在着秘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或者巴基斯坦情报当局出于某种考虑希望将祸水引向其宿敌印度，

都可能导致巴基斯坦塔利班或其他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某种形式的核武器。如果巴基斯坦塔利班获得了核武器，那么阿富汗塔利班也可能获得核武器，甚至中国新疆南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最终也可能得到一些核武器。

在中东地区，目前伊朗统治集团的主观意图，是生产出足以制造若干枚核弹头的浓缩铀，并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制造出实际可使用的核武器。但是，随着伊朗越来越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能力，以色列统治集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对伊朗发动战争冒险。无论以色列是否对伊朗发动战争冒险，随着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色列常规军事优势的逐步丧失，以色列冒险使用核武器或者以色列的核武器落入某些非国家武装集团手中的可能性都会增加。

在东北亚，如果朝鲜国家尚能保持稳定，朝鲜不会主动使用核武器。但是，如果朝鲜国家崩溃，朝鲜的核武器（或者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专家、原料）可能通过种种渠道落入韩国、日本乃至台湾手中。

总之，美国霸权的衰落，虽然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是一方面造成了若干关键地理区域的严重动荡，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为偶然的区域核战争或全球核战争而灭亡的可能性。

## 五

### 中国可以代替美国吗？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存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总危机时期。这一次总危机如果得不到克服，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

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大国中，只有中国看起来还有着某种替代美国成为新霸权的希望。在其他的“大陆级”大国中，俄罗斯虽然有一定军事实力，但是经济停滞、人口萎缩，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很尖锐，在普金之后难以保证国内政治稳定；印度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如按市场汇率计算，则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国内的阶级、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尚有前资本主义残余，生态环境危机比中国还要严重，关键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至于欧盟，内部矛盾重重，很难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统一行动，且经济上陷于长期停滞，军事上连保护自己都困难，更没有资格问鼎霸权。

相比之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中期或者以后，中国能否代替美国成为新霸权并且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新生呢？

如关于霸权问题的第三篇随笔所说，要承担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职能，霸权国家必须具有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压倒性优势，从而做到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维护和促进整个体系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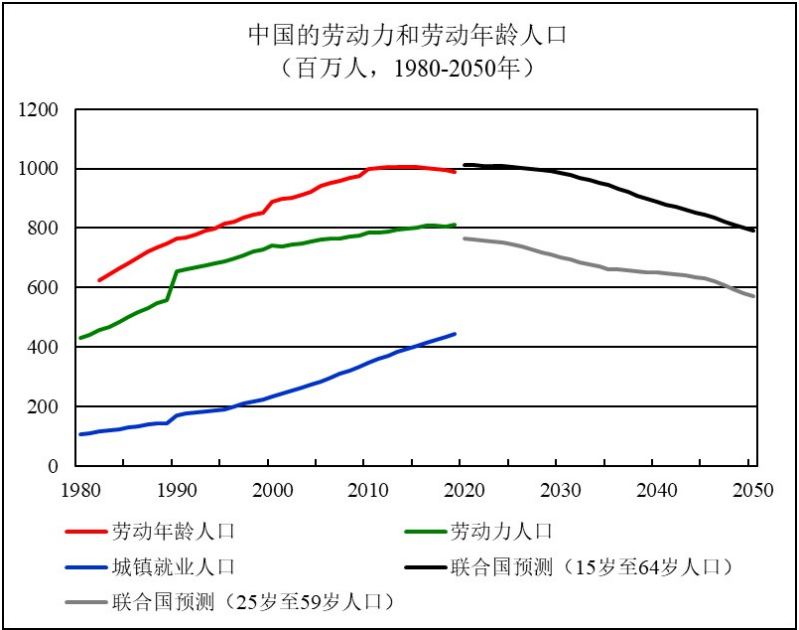
要拥有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压倒性优势，霸权国家在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军事实力方面都要建立起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绝对领先地位。在军事实力方面，按照、英、美霸权的经验，霸权国家应该有能力保持“两强标准”，即霸权国家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空军）应当至少相当于其次的两个军事强国的军事实力之和。对于假想的中国霸权来说，这就要求未来的中国军事实力要达到并超过美、俄两强的军事实力之和。

就工业生产能力来说，从以往霸权国家的经验来看，要确立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绝对领先地位，主要的指标不是工业生产的总量而是可以反映工业生产先进程度的人均工业生产水平（以及与人均工业生产水平高度相关的人均经济产值）。荷兰、英国、美国在各自的霸权时期都拥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到了美国霸权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包含了整个地球，霸权国家要拥有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绝对经济优势，不仅需要在人均经济产值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也需要拥有压倒优势。在美国霸权处于极盛时期的195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分别达到了苏联的三倍和英国的四倍。

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是否有任何希望在经济上建立起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绝对优势呢？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1.2倍。目前，中国经济在正常年景的平均增长率约为6%，美国经济在正常年景的经济增长率约为2%；如果这种增长率的差距一直保持下去，那么，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可以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以上。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几乎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先来看劳动力的情况。下面第一张图说明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总数（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在历史上变化的情况和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



如图，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已经越过峰值，目前约为10亿，预计到2050年会下降到7.9亿。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目前约为8亿，其中就业人数约为7.6亿。中国的就业总人数与联合国估计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25岁至59岁）大致相当。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分为低生育率、中等生育率和高生育率三种情景；其中，低生育率情景（假设总和生育率为1.35，即平均来说每一名妇女在一生中生育1.35个孩子）较为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按照低生育率情景，中国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现在的约7.7亿减少到2040年的6.5亿，再减少到2050年的约5.7亿，即在未来三十年平均每年减少约670万。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增加约1000万。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目前约为4.5亿，如果未来继续每年增加1000万，至2040年将达到6.5亿。也就是说，到2040年，中国的乡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将被全部耗尽。由于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从乡村部门向城镇部门每转移1000万个劳动力，大约可以贡献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当中国经济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耗竭时，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一旦中国的乡村剩余劳动力耗竭，资本家阶级将无法用曾经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来经常威胁城市工人阶级，这将导致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城市工人阶级极其有利的变化。资本家将再也无法找到所谓“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而是不得不面对大批在城市长大、宁可“躺平”打游戏也不愿意“996”被割韭菜的城市青年。到那时，已经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方式支柱的外卖员、快递员的工资成本将大幅度上升，大批依赖外卖和快递的小资产阶级将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无法靠外卖和快递过活的小资白领自身也将无法再向资本家提供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服务”；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必然最终引起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崩溃。

在一定意义上，坚决躺平，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就是现阶段打击中国资产阶级最直接、最有效、最低代价的方式！

如果中国社会低生育率的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变，那么，到21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减少到约6.8亿，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约3.3亿，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约2.4亿。相比之下，美国目前的总人口约3.3亿，劳动年龄人口约2.2亿，最佳劳动年龄人口约1.5亿；预计未来美国人口将保持缓慢增长，至2100年，美国的总人口将达到4.3亿，劳动年龄人口达到2.5亿，最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8亿。按照这一趋势，美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在二十二世纪初超过中国；如果到

时美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仍然高于中国，那么，美国的经济总量势必反超中国。

再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中国经济目前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约6%，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约1%。如果两国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保持目前的增长率差距，那么，中国经济要赶上美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约需要四十年。

但是，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中，大约5个百分点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即通过高投资来提高每名工人平均拥有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通过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一个百分点来自于自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大致相当于“纯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但是，由于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的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是一定的（中国未来的投资率还可能会下降），而随着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总量）不断增长，每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折旧的比例也必然不断增加（固定资本折旧目前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约七分之一），从而扣除折旧以后的净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将趋于下降，因而通过“资本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未来将逐步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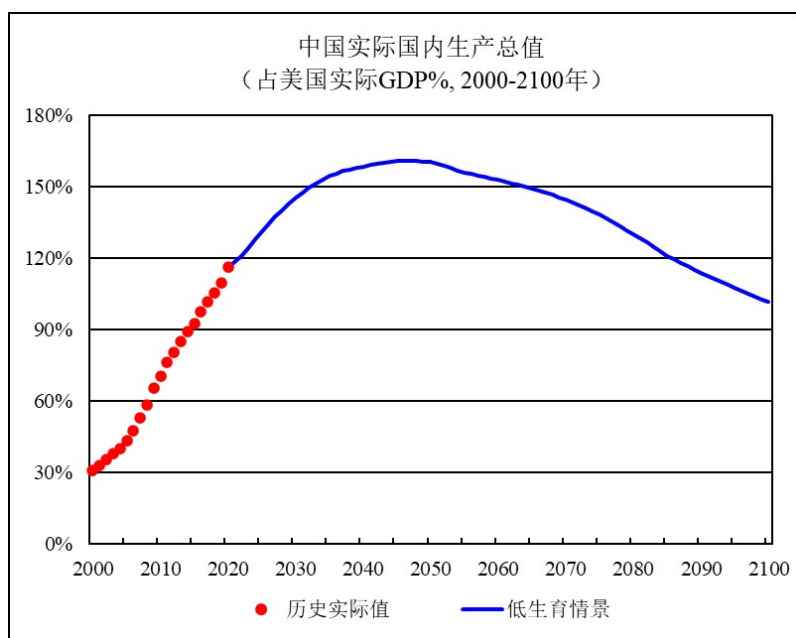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下未来经济增长的情景。在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下，我们假设，中国经济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0%，平均折旧率为5%，资本产出弹性为0.5（就是说平均每名工人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在现有知识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0.5个百分点），“自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劳动生产率增长中不依赖于“资本深化”的部分）为1%。这些假设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将从现在的每年6%逐步下降到未来的每年2%。

我们也对美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情景做了假设。在美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下，我们假设，美国经济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5%（即企业部门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经济的一半），平均折旧率为10%（美国企业部门资本存量中包括大量的计算机软件和知识产权，所以折旧率较高），资本产出弹性为0.4（就是说平均每名工人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在现有知识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0.4个百分点），“自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劳动生产率增长中不依赖于“资本深化”的部分）为1%（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长期的自发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些假设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未来将保持在每年1.7%左右（略低于美国经济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将关于未来劳动力数量变化的预测与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假设结合在一起，预计在本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约2%；在本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将略微下降到约1.8%。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长率将从现在的大约6%，下降到2030年的约4%、2040年的约2%、2070年的约1%和本世纪末的0.6%。

第二个图说明了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下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比例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情况。其中，对中国经济劳动力数量的预测根据的是联合国人口预测中的低生育率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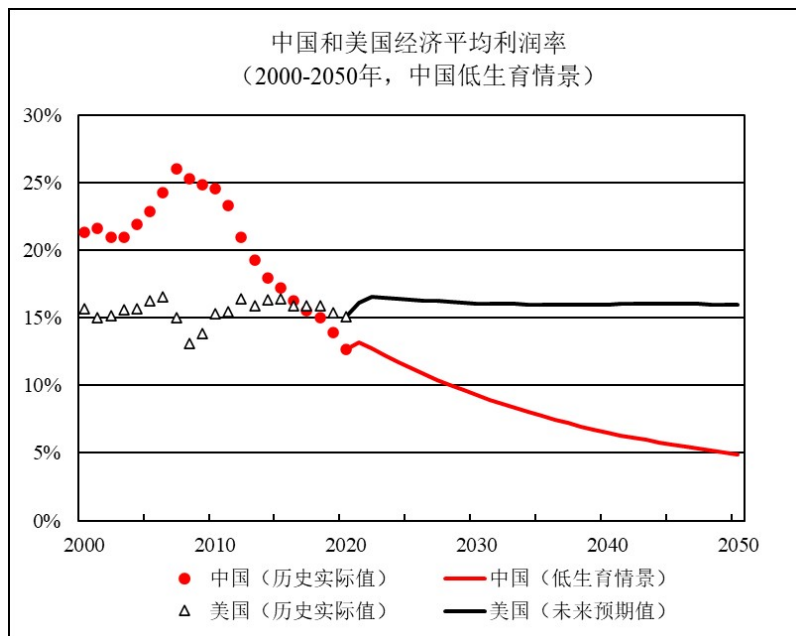


如图，至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6倍；这个比例，远远达不到确立对美国经济压倒性优势所需要的水平，仍然属于与美国经济体量大致相当的范围。2050年以后，中国经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抵消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方面的优势，从而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优势将逐年缩小；到下个世纪初，中国在经济总量方面将被美国反超。

如果比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在“正常发展”条件下，至206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美国的大约一半，仍将属于半外围国家的范围；至21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美国的大约三分之二，勉强接近核心国家的下限。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几十年能够保持“正常发展”吗？如上所述，在“正常发展”情景中，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中国经济必须要保持目前的高投资率。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长期的高投资率意味着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平均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下面的

第三个图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两国经济平均利润率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情况。平均利润率是用资本家阶级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除以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



在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一般保持在15%左右；如果平均利润率下降到13%~14%，美国经济就会发生严重危机（如2008~2009年）。按照美国经济现有的投资率，预计未来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会保持在16%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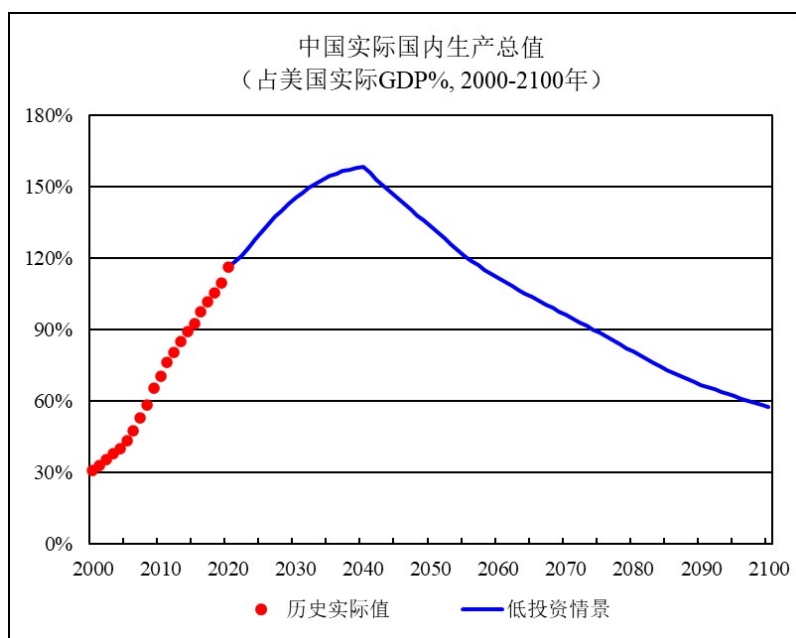
2010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曾经高达25%左右；但是，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快速下降，现在已经下降到只有12%~13%。按照现有趋势，203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会下降到10%以下；至205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会下降到仅有5%，也就是说，会下降到仅有美国经济平均利润率的三分之一。

我们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测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什么程度，中国经济就会发生重大危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2030年以后，中国经济发生投资崩溃的概率将大幅度增加。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或类似的前提下，因为自有资金不足而不得不依靠借债来维持资本积累的资本家将越来越多，从而企业资不抵债和债务违约的情形也将越来越多，破产资本家的数量也将越来越多。如果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持续地、长时间地低于世界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中国资本家对外转移资本乃至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因此，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可能无限制地长期下降下去。

此外，随着未来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资本家的总利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份额也会趋于减少；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会迫使人们将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老年人的抚养和医疗开支。这些变化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总储蓄率在未来趋于下降，从而投资率也必然趋于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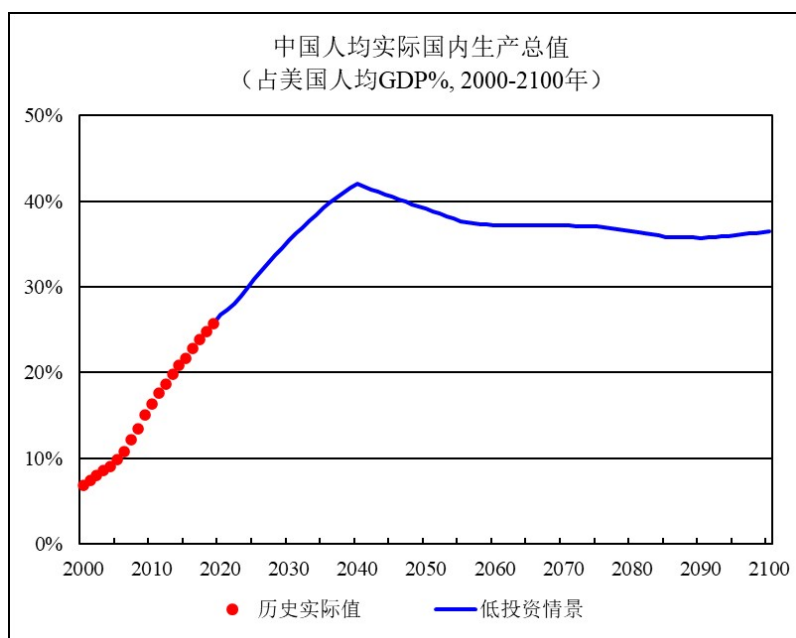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经济的投资率有极大的可能在2030~2050年之间发生大幅度下降。我们假设，从2040年起（即当中国乡村剩余劳动力完全枯竭之时），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大幅度下降一半，即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15%；这个投资率可以基本保证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2040年以后保持大致稳定并略有回升。

下面第四个图说明了在204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低投资情景的假设下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情况。



如图，在低投资情景下，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将于2050年回落到1.3倍。2050年以后，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零增长的困境。2070年，美国经济总量将反超中国经济总量；至本世纪末，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将下降到60%。

下面第五个图说明了在204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低投资情景的假设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情况。



如图，至204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是，2040年以后，在低投资情景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回落到略高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水平；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半外围陷阱”。

## 六

# 霸权与世界经济

以前的随笔介绍过，霸权国家承担着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职能。具体来说，包括：维持体系范围的“和平”、防止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对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以及建立并巩固体系范围的社会妥协。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宏观管理，在以前的几期随笔中都还没有做具体的说明。粗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读者都知道，恩格斯曾经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结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资本家各自为了私人利润自行决定生产和投资），也由于过去常常发生的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或绝对不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频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理上仍然在不断扩张，反复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对资本积累造成严重的妨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已经达到了地理上的极限。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直至发展为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对生产关系做了重大调整；主要是大大加强了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

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国家干预的加强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经济衰退变得更加“温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在全球范围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宏观管理机构来协调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关系并承担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职能。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间，总是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顺差，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逆差。贸易逆差的国家必须靠借贷外国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外国资本的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投机性，随时有可能突然撤退，从而使得贸易逆差国陷入货币急剧贬值和金融危机的困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巴西、俄罗斯金融危机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没有某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稳定的力量，贸易逆差国总是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减少本国总需求的办法来减少进口，进而缩小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力量的协调，贸易顺差国则不会有动力采取积极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因为那样会缩小本国的贸易顺差。

所以，在历史上，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霸权国家能够积极地稳定全球经济，那么，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内在倾向，是迫使所有的贸易逆差国都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迫使一些贸易顺差国也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停滞甚至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英国霸权全面衰落，而美国还没有做好接替英国霸权的准备，这种“霸权的真空”在某种程度上对三十年代全球大萧条起到了恶化的作用。

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设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充当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最后贷款者”（类似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中中央银行的角色），并鼓励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过，凯恩斯的计划受到了美国的阻挠。现在各国中央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拥有的“特别提款权”便是当

初凯恩斯设想的残余，但是已经根本起不到凯恩斯所设想的稳定全球经济的作用了。

在战后初期，美国作为毫无争议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又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出口国，在事实上充当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最后贷款国”。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和日本提供大量资金，使得西欧和日本摆脱了战后“美元荒”的困境，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反过来与美国竞争，美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的贸易账户仍能保持大致平衡）。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向海外投资；美国为了维持海外军事基地以及从事越南战争，海外军事开支大幅度增长。于是，综合来看，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整个的国际支付陷入了持续的逆差。这种国际支付逆差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枯竭，最终导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战后一度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固定汇率体系）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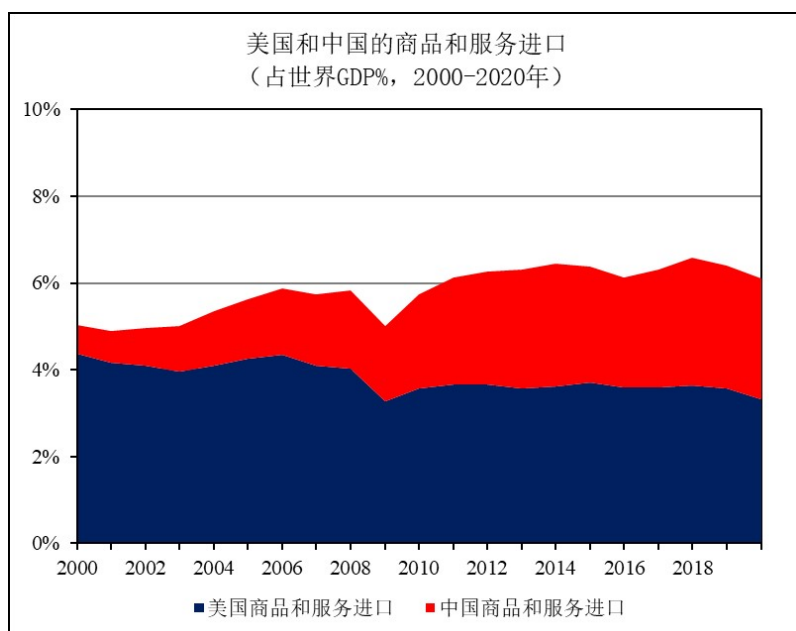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处于常年逆差的状态。在整个的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极其不稳定，金融危机频发爆发，从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巴西和俄罗斯危机，一直延续到2001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危机。

进入本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秩序。那就是，由美国利用美元仍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誉来充当全球经济的“最后借款国”（也可以叫做最后的或最大的消费者）。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发生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这种贸易逆差可以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东南亚、德国以及石油出口国）谋求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国家摆脱因为外汇储备不足而不得不紧缩国内总需求的顾虑；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我们知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一



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时，政府可以通过赤字开支来稳定经济、刺激经济复苏；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就类似于政府赤字开支在一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2004~2007年，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出现了相对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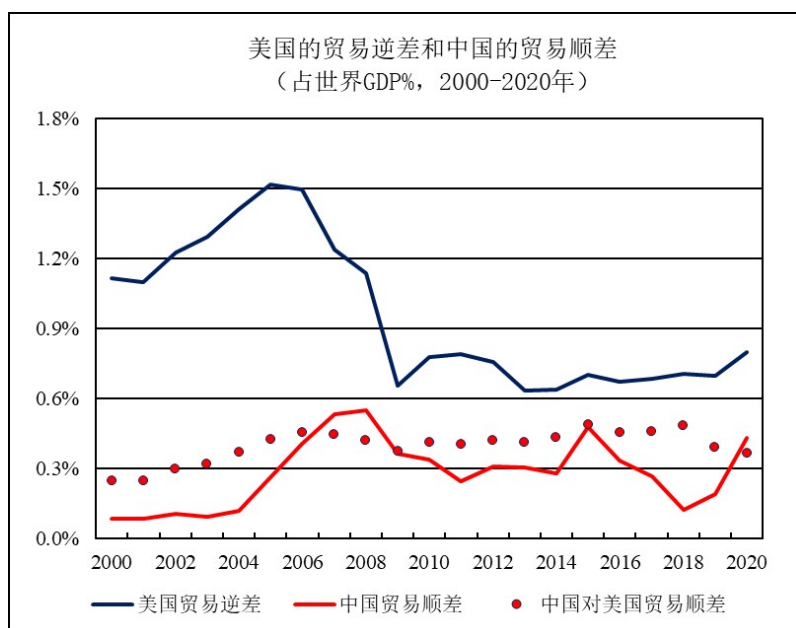
2008年，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号称“大衰退”。从那时起，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承担稳定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职能，而是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资本主义“合作”来共同承担这一职能。



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自2000年以来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

如图，在本世纪初，美国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大约占到了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这反映了当时美国对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需求扩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不到1%。但是，自201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促进世界经济总需求扩张的主要力量；在新冠危机之前，其商品和服务进口大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5%。另一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贡献

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新冠危机之前，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接近了3%。



第二个图分别比较了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2005~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一度高达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5%，这反映了当时美国对世界经济总需求的“净贡献”以及全球金融失衡的程度。自201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0.6%~0.7%之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致在0.3%上下波动。

第二个图还显示了按照美国口径计算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包括因为转口贸易而产生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在2000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中国全部的贸易顺差。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中国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但是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贸易逆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约相当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0.4%~0.5%。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约相当于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二。

以上情况表明，201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已经从以前的由美国单独负责其宏观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由美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同负责。美国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最后借款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其贸易逆差仍然起着弥补世界其他地区总需求不足的职能。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受到了2008~2009年的打击，美国已经无法单独靠自己的力量以及美元的信誉来承担这项职能了，而不得不依靠中国资本主义从外部提供弥补贸易逆差所需要的资本，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来“间接”地稳定和提高全球总需求。

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看，中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向美国等核心国家转移的大量剩余价值是核心国家利润率复苏并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从国际经济学的观点看，一国的贸易顺差相当于该国总需求超出其国内总投资以后剩余的部分，贸易顺差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净输出。如果说，美国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最后借款国”，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最后借款国”的“最后贷款国”的职能。

那么，这样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美—中共治”还能维持多久呢？这一方面取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及其在未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够提供的资本净输出。

如果美国能够在未来数年逐步缩小其目前庞大的财政赤字规模，并将贸易逆差占世界经济产值的比例大致保持在目前的水平；那么，目前这种美中“合作”共同稳定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局面应该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直到将来，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导致资本家的利润份额进一步缩小，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从而中国的贸易顺差逐步转变为贸易逆差（也就是中国从资本净输出国变为净输入国），才会触发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最后危机。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由于美国内部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以及摆脱经济停滞，美国统治集团有可能选

择冒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针（比如拜登集团目前正在企图推动国会通过的约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和约3.5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和新能源发展计划）。如果美国统治集团果然选择采取这样的冒险方针，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急剧扩大，甚至于恢复到2005~2006年的水平。

如果美国统治集团选择冒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针，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将会出现繁荣。如果全球总需求高涨，那么，全球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关键商品可能发生严重短缺并且引起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另一方面，全球总需求高涨将有助于提高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特别是促进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提高，从而引起工资成本快速上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加速并且失控。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在汇率方面就一直奉行将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政策。这种将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政策，实际上是用中国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作为美元购买力的担保。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人民币和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就会吸引中国资本家对美国大量出口，从而压低美国的物价，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回落到中国通货膨胀率的水平。这是将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移到美国的一种方式。

但是，未来如果发生全球通货膨胀失控的情况，中国资产阶级将有可能被迫放弃用人民币为美元担保的政策。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为了平抑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允许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自由升值。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失去了人民币依托的美元可能会全面崩溃，并伴随着大规模资本外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资本主义将先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的危机。

## 七

### 对“中帝论”的反驳

一个国家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必须在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方面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确立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关于霸权问题的第六期随笔中，已经论证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不可能取得相对于美国的压倒性优势。在本世纪的后半期，由于中国人口加速减少，美国还有可能在经济总量方面实现对中国的反超；在各种可以设想的未来情景中，美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都将始终保持对中国的优势。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在工业生产能力和总的经济实力方面建立压倒性的优势，自然也就无法在军事实力方面建立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取得对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自然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建立起相对于其他各大国的绝对优势，从而无法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

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大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左派中的一些“中帝论”分子，过高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军事实力有着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恐惧。他们动不动就设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甚至是在现任领导人的任期之内），中国就可以征服台湾、踏平日本，然后中国海军将控制马六

甲海峡、威慑印度洋，甚至于有朝一日将太平洋变为中国霸权的内湖。所以，笔者还是花些笔墨，说明一下这种幻想或者恐惧为什么是毫无事实基础的。

先对中、美两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做一些比较。首先来看陆军。据国外军事资料，中国现有陆军约100万，另有武装警察等准军事部队约70万；美国现有陆军约50万，另有海军陆战队约20万。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地面武装力量总数方面占有一定优势。虽然中国陆军在装备方面与美军相比尚有差距，但是近年来中国陆军的现代化水平在迅速提高。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相当尖锐，除了地方警察（大量警察尚无正式编制）外，武警等准军事部队必须全部用于镇压群众反抗、防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维稳活动。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与14个国家接壤，又与若干个国家隔海相望。中国的陆地边界线长达约22000公里，为世界第一。中国与印度存在着严重的领土争端，与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存在着领土和领海争端。在过去六十年中，中国分别与印度、前苏联、越南发生过重大的边境冲突或边境战争。七十年前爆发的朝鲜战争至今在法理上仍未结束，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未来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中国的国家统一尚未完成。这种地缘政治态势决定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中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边境和国土防御。据估计，中国陆军中，在编制上属于边防部队以及驻扎在边境地区的野战部队共有约40万人。这样，中国陆军中实际上可用于境外作战任务的不超过60万人。

相比之下，美国在地理上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无论是北面的加拿大还是南面的墨西哥对于美国本土都不能构成威胁。虽然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激化，但一般情况下靠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就可以应付。因此，美帝国主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总数70万）几乎全部可以用于海外驻军或对外侵略。

从近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争霸的历史来看，海空军对于大国争霸以及霸权国家承担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职能尤为重要。只有靠强大的海军，才能够维持全球贸易航路的安全以及在必要时对敌国实行海上封锁；而在一般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常规现代战争中，制空权有着近乎决定性的意义。

据维基百科等资料，中国海军现有现役官兵约30万人，舰艇500余艘，飞机700余架。中国海军的主要水面舰艇有航空母舰2艘、两栖攻击舰（“准航母”）1艘、驱逐舰40艘、护卫舰115艘；中国海军有潜艇76艘，其中核潜艇19艘。

相比之下，美国海军现有现役官兵约35万人，舰艇约500艘，飞机约3700架。美国海军的主要水面舰艇有航空母舰11艘、两栖攻击舰9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71艘；美国海军有潜艇68艘，全部为核动力潜艇。

就海军的主要水面舰艇来说，美国海军不仅在航空母舰的数量方面占绝对优势；而且在质量方面也有突出的优势。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全部为10万吨或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母，而中国海军现有的辽宁号航母和山东号航母仅为排水量55000吨的常规动力航母。美国航母的平均航速比中国现役航母要快50%，每艘航母可以搭载的作战飞机数量要多出一倍。中国目前正在建造的排水量8万吨以上的003型常规动力航母预计2023年才开始服役；排水量10万吨以上的004型核动力航母预计要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才能开始服役。

以中、美双方的海军力量对比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仅无望挑战美帝的全球海军霸权，而且在西太平洋的所谓第一岛链周边也很难与美国海军进行决战。

中国空军现有现役官兵约40万人，军用飞机5000多架；其中，歼10、歼11、歼16、苏27、苏30、苏35等四代或四代半战斗机约1200架；属于第五代隐身式战斗机的歼20约150架。

美国空军有现役官兵约30万人，军用飞机5000多架。美国空军现有数百架F—22“猛禽”第五代隐身式战斗机；美国空军、海军、海

军陆战队预计将于2044年前装备约2500架F—35“闪电”第五代隐身式战斗机。此外，美国空军拥有大量的先进轰炸机、地面攻击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等。

中国火箭军装备有各种近、中、远程弹道导弹1000多枚，另有巡航导弹约3000枚；美国空军装备有洲际弹道导弹3000多枚，另有空基巡航导弹5000多枚。据估计，中国现有核弹头约300枚；美国拥有大约6000枚核弹头，其中约1400枚可以通过导弹或潜艇随时发射或者通过轰炸机投掷。

以上是中、美两国军事“硬件”实力的比较。就作战经验、指挥水平和训练水平来说，美帝国主义自朝鲜战争以来，几乎每一年都参加了或大或小的战争或军事冲突，侵略战争的经验十分丰富。相比之下，自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就没有打过较大规模的战争；海军自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空军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国土防空战斗后已经几十年没有实战经验了。中国海、空军的平均训练水平也低于美军。

美国霸权虽然已经衰落，但是目前，在欧洲，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军事上控制西欧各国；在亚洲，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有驻军，在必要时可以得到日本、韩国、台湾当局等仆从国的军事支援，还可以通过印度等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相比之下，资本主义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盟国。

显然，中国目前完全不具备在军事上挑战美帝霸权的实力。那么，这种情况，在未来能不能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而得到改变呢？

美国目前一年的军费开支约为800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五分之二，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中国目前一年的军费开支约250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八分之一，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大约翻了一番（平均每年约增加8%）。如果今后二十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仍然每年增加



8%，而美国的军费开支每年增加2%，那么，中国的军费开支将在2040年前后赶上美国。

但是，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的军事实力是由以往多年的军事开支所形成的人员、装备、设施等决定的。如果假设一个国家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平均用二十年的时间来更新换代，那么，即使在中国的军费开支赶上美国以后，至少也还需要再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060年前后，才能在综合军事实力方面赶上美国。

然而，如第六期随笔所说的，如果205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加速下降，并且因为利润率和储蓄率下降等原因导致投资大幅度减少，美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70年前后反超中国。这样，即使中国的综合军事实力在2060年前后赶上美国（还远远谈不上绝对优势），很可能也是昙花一现；到本世纪末，中国又会在军事上被美国拉开差距。

#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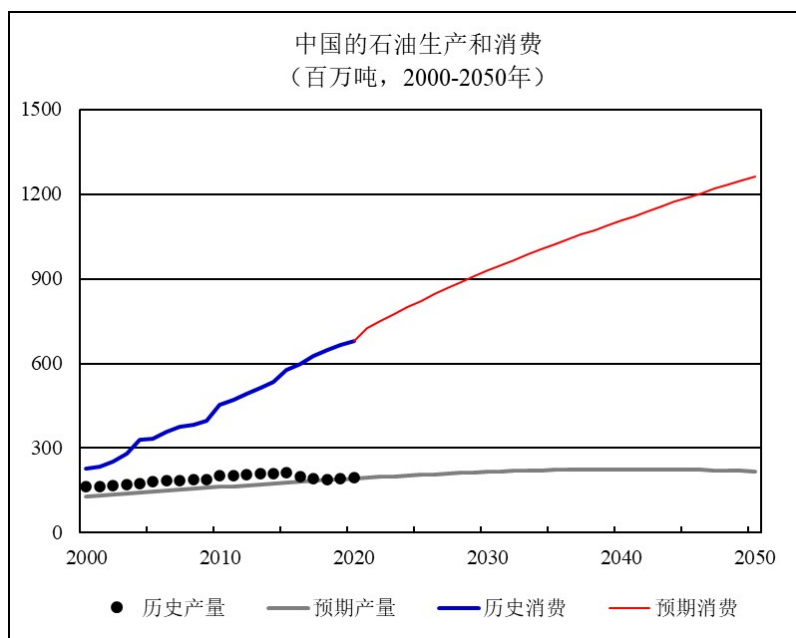
## 中国的国际前途

中国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中国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这一特殊作用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一方面，中国要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就需要对大量廉价劳动力实行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血汗工厂式剥削。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被残酷剥削以后，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终于开始枯竭；新一代城市青年开始以“躺平”的方式一方面减少生育、另一方面尝试消极怠工。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全面枯竭，此后劳动力人口将快速下降，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中国依赖对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积累模式。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不断地、快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半外围国家，中国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无法染指垄断利润，因而只能靠维持高投资率、快速提高资本劳动比的方法（即通过不断地提高每名工人配备的机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过高的投资率又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投资率大幅度下降的危险。

作为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然而，中国人口庞大而人均资源不足，因而不得不依赖从海外进口大量能源和原材料。2020年，中国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6.4亿吨（日均1300万桶），进口天然气约1400亿立方米（约合1.2亿吨油当量），进口原煤3亿吨（约合1.6亿吨油当量），进口铁矿石11.7亿吨，分别是世界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的第一大进口国。

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石油产量和消费量在历史上变化的情况以及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



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常发展”的话，至2050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将超过12亿吨，而国内产量只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两相比较，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石油进口需求将超过10亿吨。这大约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目前石油出口能力的两倍半。然而，按照现在石油生产和开采的趋势，世界石油产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以后开始下降。由于人口增长和石油产量下降，沙特阿拉伯自身的石油出口能

力到2050年也可能比现在减少约40%（见霸权问题的第四期随笔）。在这种形势下，世界石油市场将由于中国进口需求的大幅增长以及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能力的下降而出现巨大的缺口；由此产生的能源短缺将引起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大动荡。

现在，中国通过发展电动汽车，可以替代一部分石油消费。但是，电动汽车主要是替代公路旅客运输的石油消费（主要是汽油消费）；汽油消费大约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六分之一。所以，即使到本世纪中期，公路旅客运输实现了完全的电动化，也只能替代中国全部石油消费中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石油进口总量中将近一半来自于中东地区。如以前的霸权问题随笔所论证的，美国霸权衰落的第一个直接的重大后果，就是美帝失去了控制中东地区和保持该地区稳定的能力。中东地区由于内部的阶级、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几个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面临着陷入长期动荡乃至全面失控的危险。所以，就中国资产阶级的战略利益来说，最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就是在美帝撤出的条件下，如何能够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

从以往英、美帝国主义干涉中东地区的经验来看，要控制中东地区，至少需要在这个地区扶植几个可靠的“盟国”，并且建立一支常驻中东地区（尤其是波斯湾地区）的强大远洋舰队，以便必要时实行直接军事干涉。比如，美帝国主义在极盛时期，在中东地区有伊朗（巴列维王朝）、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三个盟国；后来伊朗爆发了革命，美帝又扶植埃及作为另外一个区域盟国。美国第五舰队常驻巴林，控制着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中国在中东地区过去就没有盟国，将来也很难有可靠的盟国。如果中国要在中东地区同时维持几个盟国，就需要同时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还需要中国作为霸权国家协调这些国家之间的纠纷并做出仲裁。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资产阶级有能力协调并仲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以色列

与阿拉伯民族之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地理上，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相距数千公里，并且受到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的阻隔。如果从中国本土派出远洋舰队，要经过中国自身不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要面对印度海军的监视，还存在严重的补给问题。如果中国要在巴基斯坦建立海军基地，印度资产阶级必然会做出激烈反应，美帝国主义也不会首肯。

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可预见的将来无力充当中东和平秩序的保证者和仲裁者，那么，在中国周边地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以西，是不是就可以有所作为，建立“中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亚和平秩序呢？

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果然有全球称霸的野心，那么，从霸权崛起的次序来说，中国资产阶级只有首先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区域海空霸权，然后才能去争取建立全球海空霸权。

这里，中国资产阶级面对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困境。如果中国资产阶级不首先确立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不首先控制马六甲海峡，自然是没有机会将霸权扩大到中东、波斯湾地区，更不必说西半球。然而，如果中国首先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挑战美帝霸权，不仅军事上没有胜算，而且还会直接破坏东亚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即使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挑战美帝霸权侥幸成功了，还是解决不了对中国资产阶级利害相关最大的中东地区稳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美帝只要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贸易封锁，切断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再切断来自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供应，就不愁打不断中国资产阶级的脊梁骨。

即使从纯军事观点看，中国资产阶级在周边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取得成功。在东海方面，中国海军的主要假想敌，除了该地区的美国海空军以外，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现有官兵约45000人，舰艇100多艘，固定机翼飞机约200架，直升飞机约

150架。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要舰艇有直升飞机母舰2艘，所谓的多功能驱逐舰（相当于小型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26艘，护卫舰和护航驱逐舰16艘，攻击潜艇18艘。

在战时，可能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生对抗的包括中国的北海舰队（现更名为北部战区海军）和东海舰队（现更名为东部战区海军）。北海舰队现有各种舰艇60多艘，其中航空母舰1艘，导弹驱逐舰14艘，导弹护卫舰22艘，核动力潜艇9艘，常规动力潜艇17艘；东海舰队现有舰艇100多艘，其中导弹驱逐舰13艘，导弹护卫舰43艘，潜艇19艘。

如果中国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全部投入战斗，而美国海空军又不做干预，那么，中国两大舰队相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有一定优势。不过，如果战争或军事冲突发生在远离中国海岸而靠近日本琉球群岛的一侧（钓鱼岛距离中国的福建、浙江海岸线约200海里，距离琉球群岛最西端的与那国岛76海里），日本可以投入其部署在琉球群岛的大量导弹和岸基航空兵，还可以在争议海域部署水雷。此外，日本的两艘“多功能驱逐舰”可以各自搭载十几架最先进的F—35第五代战斗机。所以，除非中国下决心发动对日本的全面战争，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日本部署在琉球群岛的导弹发射装置和岸基航空兵，否则很难掌握在东海东侧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而如果中国对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美国不可能不进行军事干涉。

在南海方面，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围绕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存在着长期而复杂的主权争议。争议最大的南沙群岛目前分别由六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占领：其中，中国目前控制着南沙群岛中的7个岩礁，台湾当局控制着2个岛礁（包括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太平岛），越南控制着29个岩礁或沙洲，菲律宾控制着11个岛礁，马来西亚控制着6个岩礁，文莱控制着1个岩礁。此外，中国海军曾经数次巡航位于南沙群岛最南端的曾母暗沙（其岩滩终年不露出海面）并宣示主权。除了岛礁的主权争议以外，印度尼西亚认为南海的一部分是其专属经济区。

中国南海舰队（现更名为南部战区海军）现有各种舰艇120多艘，其中航空母舰1艘，两栖攻击舰1艘，导弹驱逐舰12艘，导弹护卫舰33艘，核动力潜艇10艘，常规动力潜艇17艘。表面上，南海舰队相对于周边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都有绝对优势。但是，如果未来的军事冲突发生在南海的南端或西南端，则潜在冲突地区距离南海舰队所在的海南岛有1000多海里，而距离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较近。周边国家可以利用岸基航空兵和反舰导弹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国海军的优势。

此外，现在的国际政治形势与1988年赤瓜礁海战时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中国以军事手段在南海地区勉强拿下一两个岛礁，不仅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会恶化与越南乃至整个东盟的关系，严重破坏东南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到最后还不一定守得住。

最后来看一下台海地区的军事形势。台湾地区，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环节。2020年，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贸易逆差约1400亿美元（9700亿元人民币）；这反映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供应的机器设备和工业零部件的依赖。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对台湾地区的全面战争，势必打烂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甚至于威胁到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以，一般来说，只要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维持“正常发展”、资产阶级统治还能够有效运行，是绝不可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当然，以非军事手段更解决不了）。对于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来说，无论他们口头上怎样欺骗中国人民，所谓“武统”绝对是自取灭亡的下下策！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统治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候，会不会企图以“武统”台湾来煽动民族主义、恢复政治合法性呢？

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当局要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或者是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战，然后用地面部队占领全台湾；或者是用导弹或空军对台湾实行全面轰炸，以达到迫使后者投降的目的。

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对台湾发动登陆战，那么，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一共可以投入8艘船坞登陆舰和大约40艘其他大型登陆舰。按照一艘船坞登陆舰一次搭载一个加强营（900人）、一艘大型登陆舰一次搭载一个步兵连（250人）粗估，那么，集中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的所有登陆舰，一次可以运送大约17000人。

台湾岛海岸线全长约1100公里。台湾岛东岸多为悬崖峭壁，不适合登陆；西岸大部分为绵延的浅滩，在海面以下延伸三至七公里，不适合大型舰船靠近。在台湾岛的全部海岸线中，只有大约100公里适合在涨潮时登陆。台湾当局现有陆军约10万。这10万陆军哪怕是在适合登陆的100公里正面上平分，每公里正面上就可以部署1000人；这样，在任何一段20公里的正面上就可以形成相对于企图登陆的中国资产阶级军队的优势。一旦台湾方面发现大陆军队开始登陆，可以在24小时内集中5万人于登陆地段，形成相对于登陆部队的绝对优势。战时，台湾当局还可以征召预备役；台湾当局号称拥有“后备军人”约240万。

以上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的登陆部队可以全部完整地出发地运送到登陆点。实际上，登陆部队要在台湾海峡经历8个小时的航程，在整个航行过程中，随时会受到台湾海空军以及导弹的袭击，在接近海岸时，还会遭到海岸炮火的轰击。国外军事评论认为，只要台湾方面设法击沉十几艘中国大陆方面的登陆舰，就可以实际上摧毁大陆方面登陆成功的一切希望。

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当局选择对台湾实行空军和导弹全面轰炸的方法，则一方面会受到台湾方面防空导弹和反导弹导弹的拦截（台湾拥有大量的可以在公路上机动的远程和近程地对空导弹），另一方面还可能遭到台湾发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报复（这些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可能会威胁上海、广州或者三峡大坝）。不仅如此，对台湾的全面轰炸会摧毁台湾的工业生产能力（从而使得对台湾的征服完全失去经济价值），引起台湾人民的强烈愤慨，世界人



民更是无法理解。中国资产阶级将失道寡助，美帝将很容易以“保卫台湾民主”的名义争取到对台湾军事干涉的国际支持。

## 九

### 结语

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人们从不同的理论观点、政治立场出发，往往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即使到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范围内还是在反马克思主义者范围内，关于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真资本主义，是整个的资本主义还是局部的资本主义，是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不是资本主义还是整个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等等，都还有一些争论。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国一地的局部地理范围跳出来，从眼前的几十年（世界历史长河的一个短暂瞬间）跳出来，那么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别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与此前的各个历史时代（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历史时代）相比，有着哪些本质的特征。所谓“本质”的特征，就是说，这些特征贯穿着整个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规定着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的运动规律；如果离开了这些特征，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有哪些本质特征呢？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也就是自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在满足全部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外还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分裂为各个对抗性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终年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不占有剩余产品；占社

会极少数人口的剥削阶级从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且独占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阶级以及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国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但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及剥削阶级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这些都是所有阶级社会共同的特征，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独有的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历史特征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阶级不仅独占社会剩余产品，而且将剩余产品中比较大的一部分拿出来经常地、反复地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又从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剩余产品演变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又表现为利润、利息、租金、税收等）。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各个人类社会的人口以及物质生产总量的增长都是比较缓慢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及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在西北欧的一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口和物质生产总量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到了二十世纪，差不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都形成了这种物质生产按照几何级数不断扩大的趋势。

无论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将剩余产品中比较大的一部分经常地、反复地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物质生产规模按照几何级数不断增长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区别于以往各个历史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时代，人类各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规模一直发展缓慢甚至中断和倒退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伟大”文明在政治上往往采取中央集权帝国的形式。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可以保证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内有基本的秩序和安全，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及商品贸易的正常往来。但是，在中央集权帝国下，帝国往往会攫取剩余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统治者的奢侈消费以及完成某些公共

职能。这样，在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早期商业资本家或手工业资本家往往不会有很大的动力将利润用于资本积累，更不会将资本投入有较高风险的物质生产活动。

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不同，在西欧，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在经历了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和农民起义以后，中世纪时代的等级封建制和庄园农奴制全面瓦解。到了十五世纪，西欧开始出现了若干个早期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彼此之间在领土和人口资源方面大致相当，在长期的相互征战中，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和消灭其他的“民族国家”。

为了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占得上风，西欧各国在各自的财政收入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纷纷向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的商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借贷。到后来，为了扩大潜在的税收和借贷来源，西欧各国又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帮助某些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起初主要采取扩大海外贸易的方式）。这时，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才初步具备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雏形才开始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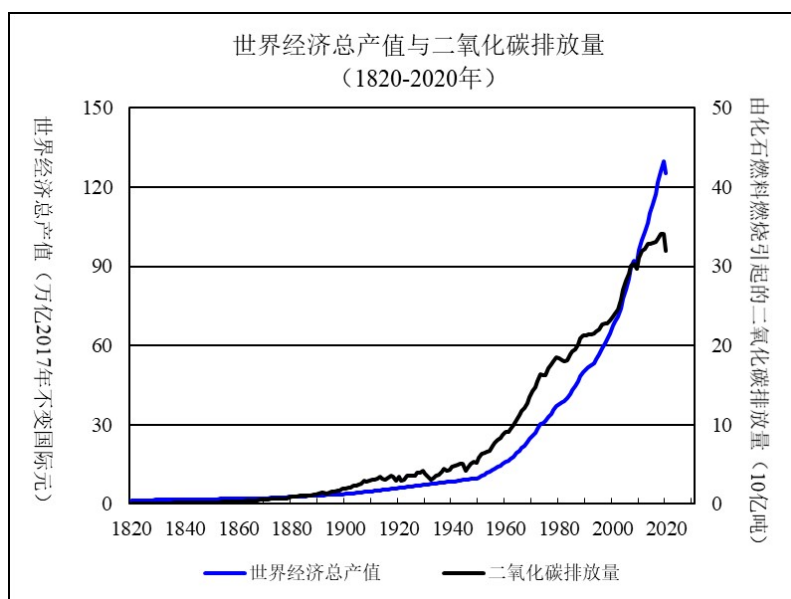
然而，仅仅是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还远远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发展。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人口的增长以及物质生产的扩张往往受到一个地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限制。事实上，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经济已经接近传统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生态极限，森林被过度砍伐（森林覆盖率从罗马帝国末期的95%下降到十七世纪初的20%），贵金属资源开始枯竭。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是靠着不断的地理扩张才摆脱了欧洲自身所面临的生态困境。

对美洲的征服不仅给新兴的西欧资本主义带来了大量贵金属，而且还带来了新的农作物，使得单位土地面积能够生产的热量大幅度提高，促进并保障了欧洲人口在此后几个世纪的大幅度增长。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所生产的大量的糖，为欧洲人口提供了热量补充，连西欧普通的工人阶级都能够享受到。用在印度和北美种植的

棉花制成的棉织品，不仅比毛织品和麻织品更加舒适，而且使得英国等核心国家可以节约用于养羊或种植亚麻所需要的土地，从而加快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工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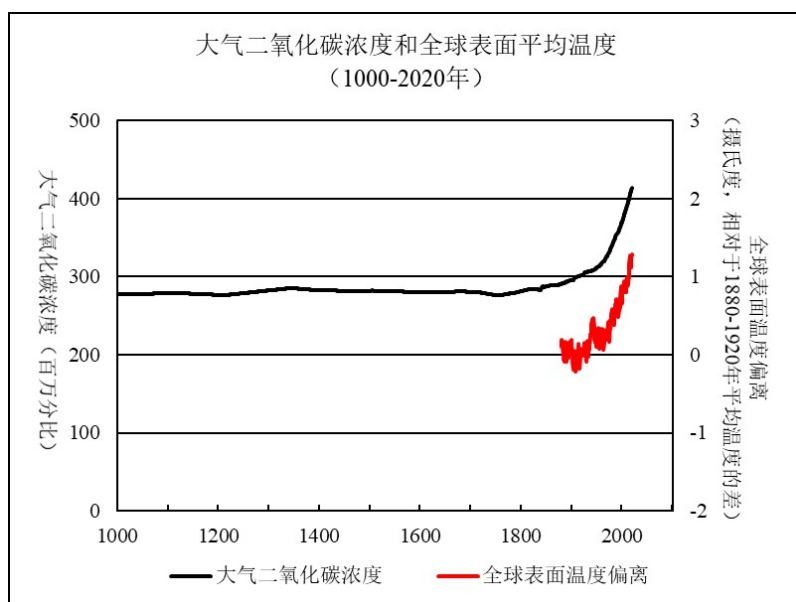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到全球，要支撑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还是要靠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特别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历史上，在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中，90%以上的劳动力都束缚在农业生产中，以保证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食物生产。即使在全球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劳动力中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从事农业生产；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全世界劳动力中仍然有大约二分之一在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力大量地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全球资本积累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在过去约两个世纪中，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通过大量增加化石燃料的消费、用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代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木材、秸秆、动物粪便等）来实现的。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自十九世纪初以来世界经济总产值以及由于化石燃料燃烧而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各自增长的情况；后者可以反映化石燃料消费增长的情况。



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产值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几乎同步增长。1820~2020年，世界经济总产值增长了大约60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大约59倍。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导致了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的持续、大幅度上升。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自公元1000年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情况以及自1880年以来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变化的情况。



上图中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情况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资本主义时代给地球的大气层以及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所打上的深刻烙印。在工业化以前时代（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曾经长时间地稳定在大约280百万分比。2020年，这一浓度已经增加到414百万分比。在过去十年中，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24个百万分比。按照这一速度，至本世纪末，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超过600百万分比，相当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两倍多。

如果以1880~1920年的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作为工业化以前时代平均温度的近似值，那么，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相对于1880~1920年平均温度的偏离就可以大致代表相对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全球变暖幅度。据此计算，2011~2020年的平均温度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已经上升了1.1摄氏度（其中，2020年的平均温度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上升了1.3摄氏度）。在过去十年中，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增加了0.3摄氏度。按照这个速度，到本世纪末，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以前时代增加三摄氏度以上。

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将引起西南极洲冰盖融化，进而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5~10米，淹没世界上数量众多的沿海城市。全

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以后，还会通过南北两极附近的冰盖或海冰的融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植被变化，引起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系列气候反馈。比如，北冰洋海冰融化后，将不再反射太阳光而是吸收太阳光带来的热能；北极地区的冻土带融化后，会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大洋中的浮游生物可能大量死亡，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溃。

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亚马逊热带雨林将崩溃，整个的亚热带地区将全面沙漠化，几十亿人口可能成为环境难民。到那时，人类将完全失去对全球变暖过程的控制，即使不再有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也将最终超过六摄氏度。

人在生理上可以承受的湿球温度（湿度100%条件下的温度）的极限大约是35摄氏度。超过这个极限，人体将无法有效地向周边散热，新陈代谢过程将很快崩溃；如果是在室外从事体力劳动的条件下，人体可以承受的湿球温度极限大约是33摄氏度。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的人口生活在年最高湿球温度在28摄氏度以上的地区。所以，如果全球变暖超过六摄氏度，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可见，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在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世界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面临坍塌。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要避免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并维持人类文明的存续，必须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两摄氏度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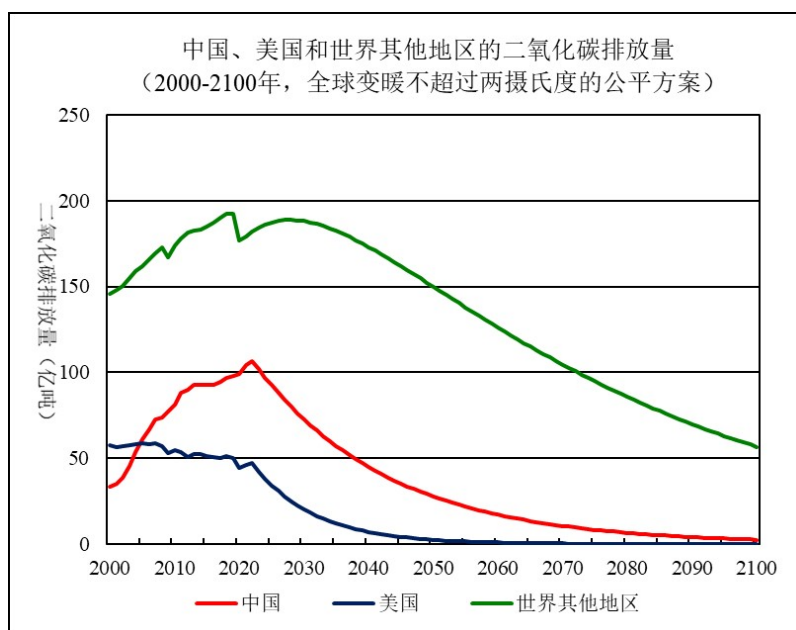
要将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从现在起到本世界末，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能超过1.3万亿吨；这1.3万亿吨就是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既没有公有制计划经济，也没有世界政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彼此相互竞争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所以，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必须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各个民族国家。



在这个随笔系列中，我们反复论述的一个观点，就是霸权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发展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去，霸权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维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和平”、维持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宏观稳定以及建设并巩固体系范围的社会妥协。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协调乃至限制各个民族国家的资本积累，从而将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限制在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所允许的范围内。

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31%，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14%，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如果将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按照世界各国人口在各个国家之间“公平”分配，那么，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大约是2300亿吨，美国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大约是500亿吨。

下面第三个图说明了在全世界碳排放总预算“公平”分配条件下，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各自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



如图，在“公平”分配条件下，如果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23年开始下降，则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从2023年起直至本世纪末，每年下降约5%；如果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23年开始下降，则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从2023年起直至本世纪末，每年下降约10%。此外，世界其他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在2030年以前就达到峰值，此后逐步下降。

那么，中国和美国能否通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办法来一方面满足全球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维持必要的资本积累速度并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呢？

目前，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主要是用于生产电力。如果我们假设，到2100年，全世界的电力生产可以实现100%的“去碳化”（即全部用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来生产）；再假设，到2100年全世界初级能源消费中70%用于电力生产（目前世界初级能源消费中大约40%用于电力生产），而不用于电力生产的30%全部来自于相对最清洁的天然气。那么，至2100年，全世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大约可以下降到每吨油当量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约700公斤。

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大约是每吨油当量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约2.4吨。这样，按照上述的乐观假设，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全世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最多可以下降约70%，年平均下降约1.5%。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假设全世界经济产值的能源消费强度年平均下降约1.5%，那么，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经济产值的碳排放强度最多可以下降约90%，年平均下降约3%。

考虑到中国经济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大约高出70%，如果假设至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世界平均水平趋同，那么，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碳排放强度最多可以下降约95%，年平均下降约4%。但是，如上所述，如果中国要按照全世界碳排放总预算分配的“公平”方案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减少约5%。两相比较，中国经济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负增长约1%，才能

将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在“公平”方案所允许的范围内。

至于美国，如果要按照全世界碳排放总预算分配的“公平”方案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减少约10%。如果美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从现在起每年减少3%，那么，美国经济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负增长约7%，才能将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在“公平”方案所允许的范围内。

显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在经济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维持资本积累或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大国又无法代替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全面瓦解的总危机。在未来几十年，由于现有霸权秩序的崩溃，中东等地区将面临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进而威胁欧洲的稳定；全球经济将由于失去有效的宏观协调而陷入长期动荡；全球生态系统将迅速走向崩溃；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掌握了核武器或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因为各种偶然原因引起区域乃至全球核战争的风险将不断上升。

那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结人类以前，饱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能否及时地终结资本主义并开创美好未来呢？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传统核心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形成的阶级妥协秩序已经濒于瓦解。然而，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伴随这一分工体系而运行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彻底分崩离析之前，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分享来自于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在可预见的将来，传统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尽可能维护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获得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利益，增加核心国家资产阶级的困难。以革命方式来根本改造现存社会秩序，既不是核心国家工人运动目前的政治

目标，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彻底崩溃之前，也不符合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眼前的直接物质利益。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广大的外围地区，许多国家由于无法被有效地吸收进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已经沦为无法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所谓“失败国家”（包括非洲的广大地区以及中东、中亚乃至东欧的一部分）。在这些“失败国家”中，在阶级、种族、宗教等复杂矛盾的压迫下，广大劳动群众常常在死亡线上挣扎，朝不保夕，不得不寻求或追随某些极端宗教团体，以获得最基本的“保护”。

在部分外围国家，如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秘鲁等，仍然存在着争取摆脱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压迫、以劳动农民为主要群众基础的武装斗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条件，这样的斗争已经无法进一步发展为可以夺取一国或数国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尼泊尔，所谓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以后很快腐化堕落，甚至无法完成并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若干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半外围国家，如若干拉丁美洲国家，曾经一度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些号称“左转”的进步政权。但是，由于这些进步政权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做后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依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从来没有跳出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实行有限社会改良的局限。一旦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这些进步政权便纷纷陷入困境。

未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形势要发生根本性的转折，需要在一个无产阶级力量强大的大国首先发生革命，这样的革命需要从一开始就打碎全球资本主义分工的关键链条，进而带来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在未来几十年，只有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才有可能符合这样的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为了打击本地区的工人阶级，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纷纷将工业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剥削中国的广大廉价劳动

力。但是，在经过了了几十年的快速资本主义积累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将有力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在这方面，他们还将得到政治上逐渐觉醒、逐渐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援助。另一方面，与历史上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既力量也无意愿用认真的社会改良来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这样，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论是从自身的眼前利益出发，还是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或者是从自身可以动员的力量以及可以团结的力量出发，才有充分的理由以及充分的条件可以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推向现存社会秩序可以容纳的界限以外，从而不仅推翻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吹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号角。